

坦桑尼亚最后的狩猎部落

黄开发



因而导致改变。这种变化植根于追求欲望满足的人性，是不可阻挡的。哈德扎比部落长期被时间遗忘，而现在，时间已经开始了。

在与哈德扎比人相处的两个多小时里，我们看到了预期的钻木取火、丛林狩猎、射箭演示、烧烤动物，还看到了在旅游景点常见的表演，这些不是他们本然的生活，是做给我们看的，而且有一个完整的流程。这里没有一般景点常有的引导和提示，而是默默地进行。一次次游客到访，他们的眼光，他们的镜头，使哈德扎比人明白来客们最想看到的是什么。游客们也以看到这些典型的丛林原始部落符号而感到心满意足。

这种游客对旅游对象的观看可以用“游客凝视”一词来概括。英国学者约翰·尤瑞借助福柯“医学凝视”的理论，提出“游客凝视”的旅游人类学概念。凝视是一种观看方式，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。从哈德扎比人身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凝视对凝视对象的深刻影响。尤瑞认为，凝视是通过标志（signs）和差异建构起来的，旅游包含着收集标志和寻找差异。现代旅游借助摄影进一步强化凝视的主动性，并定格了凝视对象，从而对后者造成影响。

游客凝视强化了哈德扎比人的一些特点，同时也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。在所见的哈德扎比人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始终沉默甚至不愿意看我们一眼的年轻妇女。我在穷游网上找到一篇游记，其中展示了多年前拍摄的哈德扎比人的照片，照片中的几个女子都是上身赤裸的。其中有几篇游记说，向导在到达之前，要他们等一下，他先去通报一声，因为哈德扎比人平时是不穿衣服的。我们看到的所有当地女子都把自己的身体遮蔽得很严实。游客的凝视把外界现代文明的羞耻感带给了他们，改变了他们对身体的观念和穿戴习惯。这让我想到了伊甸园的故事：亚当、夏娃吃了能够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，知道自己也是赤身裸体，便拿树叶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在上帝到来时，又因为感到羞耻而躲藏起来。被凝视带来的羞耻感改变了本来的淳朴和天真。

当然，改变哈德扎比人的远不只是游客的来访。他们是坦桑尼亚最早的居民，据称已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一万年。“一万年”不知何所指，反正可以理解为很久很久。近两百年以来，他们被马赛人和西方殖民者从自然条件良好的恩格罗恩戈罗、塞伦盖蒂等地区赶走，农牧业又不断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。我看到过一张反映他们生存地区变化的地图。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这个部落的活动范围超过六千平方公里，而今被压缩在只有原来面积四分之一的区域。现代文明潮水般不断地涌来。哈德扎比人居住的丛林地带已经覆盖了电信信号，甚至还有微弱的3G网络信号。游客们更像是现代文明的先遣队，以亲切、友好、欣赏的态度走近土著人，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起后者对外界的好奇和好感，改变着他们的观念。

余光中《我之固体化》一诗中的词来说，哈德扎比人在与现代文明接触的很长时间里，都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”。而今，这块冰开始融化了。作为旅行者，我们到处找寻那些尚未被现代文明同质的“世外桃源”，而我们的凝视却在无形之中改变着它们。

更多图片（均由作者提供）请见“文汇”App和“文汇报”微信公众号

面包树，很快没人密林深处。三个猎人分开行走，用口哨、动物叫声互相联络。几声急促的口哨响起，只见一个猎人正朝树丛上方拉满弓弦。一阵人欢狗吠，射中的只是一只松鼠。我们不免有点失望——满心希望打到羚羊之类大些的动物。不一会儿，又是一阵忙乱，这次倒霉的还是松鼠。一行人开始返回，在两棵猴面包树前停下来，猎人们分别爬到树根上方一个洞口，用一个搁在那儿的半截可乐瓶喝水。我很好奇，爬上去看，树洞里积存着茶黄色的雨水。接着，三个猎人开始准备丛林烧烤。一人把一块软木放在地面的刀片上，双手摁住；另一个用细长的圆木棍垂直抵紧软木，然后用手掌快速滚动，不久冒出一缕青烟；第三个把火种放入不久软草中，吹了几口气，软草点燃。猎人们把两只松鼠烤了一会儿，取出剥皮和去除内脏后，放到火中再烤。他们分享着烤肉，又用刀尖挑了一小块给我。出于礼貌，我把它放入口中。

回到窝棚边的空地上，一个小伙子站着演奏一种像二胡的弓弦乐器，琴筒里飘出轻快的抒情曲调。另一个小伙子在耐心地教我十二岁的儿子射箭。过一会儿，出场七八个男女，围成一圈，边跳舞边唱歌。完后，我妻子从钱包里掏出一先令，一个头戴兽毛装饰的男子过来，主动伸手拿钱。我们要走了，三个男子手持弓箭，一直把我们送到车前。大家在越野车前站成一排合影，然后握手告别。我一下子感到，哈德扎比人从一开始就是把把我们当作

游客来接待的。我读到的游记和资料都强调，这是一个顽强守卫自己生活方式的部落，他们拒绝现代文明的侵入。政府曾经在山下给他们建房子和寄宿式小学，他们下山了，但是一年后重回密林。还有牧师送每个家族一些羊，希望这些羊繁殖下去，把哈德扎比人转变为牧民，可是不久那些羊都被吃光了。而我现在却清楚地看到了变化。

据向导介绍，上世纪90年代，哈德扎比人还是刻意地与外人保持着距离，很难靠近。他们很善良，知道有人在找他们，送来东西。为了回报，他们会把猎物挂在树枝上，看到来人，指指猎物，示意这是给他们的，然后快速消失在丛林中。那时候，他们还不穿衣服，只是用兽皮和植物的叶子遮蔽身体。他们仅从山下打铁的达托加人（Datoga）那里，用猎物和猎物制品换取箭镞、刀具、食盐等生活用品。

现在却大不同了。来之前，我问司机到哈德扎比人那里需要注意什么，能送他们一点什么。司机说，没有什么禁忌，可以给他们一些衣服和饮用水。看到他们的第一眼，我就注意到他们穿着蓝、白、褐等不同颜色的短裤和半截裤，其中有牛仔裤；择菜的女性上身裹布，下身裙装。这些服装显然来自外面的世界，他们已经接受了游客的来访，不再拒绝外面的馈赠。然而，在接受、看与被看之间，双方是不平等的。一旦接受外界的帮助，就有了比较，会发现与外界的距离，内心的平衡就会打破，

上学记

程盼

名便由此而来。更不用说学院路附近的北大、清华、人大和师大四大名校了。

原以为民国时的小学中学，是一路玩着读书的。经读何先生的《上学记》，却发现完全相反，那时念好中学，也是十分辛苦的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27页写道，小学三年级的英文老师极其严厉，每天须默写十个生字，写不出来不准回家，错多了还要打手板。23页又记述，他上中学的主课是国文、英文和数学三门，“那是真正吃力的”。上学的那一辈学生中，除了极少数有家学渊源外，绝大多数的古文功底都不行。每天不仅要学古文，而且还要写文言文作业，可是苦极了，想不及格不容易，但拿高分也别想。更何况何先生的两个姐姐，一个上北大经济系，一个考上了化学系，这就更令他在整个中学阶段过的是如履薄冰的日子了。所以，写去北海国图（1998年12月12日，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）借书，一路上骑车飞奔的情景，大概是苦中作乐了。

1997年我上人大附中时，附中已

跃升为海淀第一中学，排名在清华附中、北大附中之上，在北京仅次于赫赫有名的四中，也即过去的男四中。人大附中有两个重点理科班，学生的目标冲着北大、清华。我在文科班，几个文科班也是人才济济，有很多是人大、北大、清华和中科院的子弟，同学之间的竞争处于白热化状态。从学院路骑车到附中，路上三三两两的附中学生，也许都是怀着一种直奔战场的心理吧。何先生从小学到中学，始终处

2019.12.11

爸爸的『大书』

曹景行

到了总理的高度肯定，而且是在1972年那样特殊的时间。因为我们家人都认为父亲在当时环境下出这种“不合时宜”的书，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和精力，实在是吃力不讨好，傻得可以。

现在回过头去看，这本皇皇巨印是父亲半生研究和二十年资料搜集的结果。1971年在香港最终能够问世，是他校阅出版周作人《知堂回想录》后，了却的又一桩心中牵挂。1972年夏天，正是父亲在澳门镜湖医院度过的人生最后时刻。如果他那时知道总理对“大书”的赞赏，一定会带着笑容离开。

父亲是个十足的戏迷，1956年他第一次从香港到北京，晚上少不了看戏。十来天里，九岁的我就跟着他到长安大戏院听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，看了讲“周处除三害”的武戏，还看过中国京剧院根据蒙古国同名话剧改编的现代戏《三座山》。后来几年他每次进京或到内地其他地方，看戏一定是工作和采访之外最重要的事情。

尤其是1959年国庆，各地名家名剧会聚到北京献礼演出，更让他兴奋不已。对他而言，同期在北京登台的全球闻名苏联乌兰诺娃芭蕾舞，吸引力远不如红线女、马师曾的粤剧《搜书院》《关汉卿》。汇集和保留现代中国戏曲音乐资料的想法，应该就是从那会儿浮现的。

父亲对中国戏曲源流的研究，同抗日战争有关。1932年“一二·九”淞沪抗战，他避乱苏州遇上昆曲，连续追看了几个月；1938年秋天，他作为战地记者随军转移到江西东北，又接触到了弋阳腔，从此开始对南曲流变和各方戏曲沿革的研究和史料搜集。他在“大书”的总序中说“我个人并非戏曲专家，却在抗战八年中摸清楚了南曲的血缘演化，作为地方剧种的研究者，慢慢理出了一个头绪来了”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北行，他看到中国各地戏曲艺术确实呈现了前所未有的“百花齐放”，由衷欣喜。他说，“百花”的“百”，乃是实词，并非虚语，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，都得以“百”计的。“我在鸭绿江畔安东（丹东）城中，看了那儿的越剧团《红楼梦》演出，真的比看了在市场上出售（南方的）的香蕉和荔枝，还更感动些。”

“这便是我们要保留这些图片的主因。文学艺术原是反映社会安定文化进步的上层征象。”自此，他香港家中书架上有关戏曲剧目的剪报杂志资料就不断增多加厚，分门别类，也年复一年写了好多篇报道和文章谈戏谈曲谈剧谈艺。姐姐曹雷走上戏剧和电影的事业路径，让父亲更加高兴，似乎弥补了他人生中一直想做却做不成的一大遗憾。可以说，他也是为女儿搜集保存这些资料，从香港遥遥寄托自己的期望。

即使后来内地整个气氛和环境有了很大变动，他不仅没有“识时务”停手，更动了出书的念头，以求永久保存手中的资料。“我们从艺术观点，把过去二十年间的戏曲艺术的史迹编刊出来，该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。我个人能在这儿快炙献曝，尽一点微力，实在愉快得加”。但此时的父亲已是“贫病交加”，既无家可倾，亦无产可荡，只得寻求出版商相助，终于成事。大书印出了，1971年新年伊始父亲就写信告诉上海的曹雷：“我编了一部有关地方戏曲艺术的记录书，彩色精印，有十八斤那么重，希望能留下给你。我相信十年以后你看了，一定会很满意的。”三个月后他又在信中告诉她：“那部大书目前你不必看，十年后你必须看一遍，才知道我用心力之勤之苦，这书大家都承认会传下去的。”十八斤，应该说的是真皮封面那本。

真是到了十年之后，我们才第一次拿到和翻看爸爸的大书。那时，内地已经改革开放，父亲的回忆录《我与我的世界》成为三十年后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他的作品。时间一晃而过，“大书”出版已经半个世纪，周总理去世也已四十四年。此记。

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念的书。六年之间，每天从北京学院路北段教育部某小区骑车到学校，早晨六点半出发，下午四点多回家，风雨无阻。这番情景，让我想起原先读过的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。

何先生家住北沟沿，现在叫赵登禹路。对面街上有个小商铺，卖油盐酱醋，有时也卖青菜。一个掌柜，两个学徒，总是这三个人。当时是土路，经常有赶大车的人从乡间来，一进门掏出两个铜板，说：“掌柜的，来两口酒。”掌柜的就把一杯酒，一盆花生，一起移到他面前。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，星期六下午没有课，他就从家里骑车十几分钟，到北图借书。北图环境不错，周围是柏油路，骑在上面便发出沙沙沙的声音。考上北师大附中，骑车花在路上的时间可就多了去了。

每天清晨六点半从家里出发，经北京科技大学南门，左转至北航东门，在学知路口再右转，就到了知春路，路上大约要花半个小时，是距附中最近的一条线路。如果从科技大学西门拐到地质大学、北京语言大学，要经五道口、清华南门、北大东门，路上大概要多花二十分钟。因为每天急于赶到学校上第一节，所以不敢玩心太大，选择后一条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走的两条线，都算是“学院之路”了。著名的八大学院——北京钢铁学院（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）、北大医学部、地质学院、石油学院、矿业学院、农大、北林和北航，分布在两旁，“学院路”的地

我们家里叫它做“大书”，爸爸的大书。

说是大书真不假，动笔前我特意拿出磅秤，六公斤半，大概十三斤半；A3纸大小，半尺厚。枣红色的皮封面，烫金两行毛笔字“《现代中国戏曲影集》 浙东曹聚仁辑”，下面跟着他的印章，很是隆重。

近四十年，父亲的作品在内地和香港出版、再版和重印的，总数不下七八十种，就是这本“大书”没有出版社敢承诺再版。好在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出了他的文集《听涛室剧话》，收入了“大书”中二十万字，但也只占全书的一部分。文字部分无法与书中两千多幅剧照、图画资料对照呼应，总是不小的缺憾。

我们在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两本“大书”，真皮封面的那本现在存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“曹聚仁文库”内，人造革封面的放在姐姐曹雷家的书房中，时间长了也少去翻动，外表已经有点龟裂。没想到不久前我接到凤凰卫视老同事马鼎盛从香港打来的电话，核对有关他母亲红线女的一段史料，让我们又拿出父亲的这本“大书”。

广州的《南方日报》三十三年前刊登了红线女纪念周总理的文章，说到1972年的一个夏日她去总理家，他正在看“厚厚的一本书”，见到她就说：“你来看看这本书，有意思的。”红线女看了，“原来这是香港曹聚仁编写的一本文艺集子，其中介绍了全国各地的一些优秀电影和舞台艺术等作品，还有介绍粤剧《关汉卿》的图文”。她高兴地对总理说：“现在看到这个，真是难得极了。”她请求总理把书送给她作纪念。总理说：“不行。要把它送到历史博物馆，让大家都能看到。”

红线女回忆中的短短这段，给了我两个没想到。首先没想到这本“大书”能够到达总理手中，因为太重太大没法从香港寄北京。实际传递途径，很可能是我父亲托交好友香港《大公报》社长费彝民，由当时新华社专责部门运到北京，直接送抵总理办公室。再有个没想到是“大书”得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